

鸞堂研究的新視野：《飛鸞走筆：赤山鸞堂、公廟與地方社會》書評

撰文／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教授 謝貴文

鸞堂是以扶鸞為主要儀式的宗教組織，大多以儒家義理來教化百姓，故亦有「儒宗神教」或「聖教」之稱。所謂「扶鸞」乃由乩手先經「請鸞」儀式，再進入神靈附體的恍惚狀態，以鸞筆在沙盤中寫字，由其旁的鸞生報出及記錄，即成為一篇乩文；累積到一定數量後，再將其集結成書，此即是鸞（善）書。鸞堂通常崇奉關聖帝君、孚佑帝君、司命真君，稱之為「三恩主」，主要是吸收清代流行於中國的末劫觀，宣稱玉帝將降災懲罰世人道德淪喪，三恩主不忍人間遭此劫難，乃透過飛鸞宣化方式來教化世人，而形成鸞堂的組織，以宣講及行善為重要活動。清末創立的宜蘭醒世堂為臺灣本島最早的鸞堂，日治初期因鸞堂信仰有助於戒除鴉片而快速擴展，但後來受到西來庵事件與皇民化運動影響，而逐漸沉潛下來。戰後初期仍存在不少鸞堂，在地方社會具有一定的影響力，但隨著時代變遷與社會轉型，多數已不再運作，少數則附屬或轉型為公廟，持續發揮飛鸞勸化的作用。

歷來學者對於鸞堂已有許多關注，或梳理整體或個別鸞堂的發展歷史，或考察扶鸞及宣講的儀式活動，或分析鸞書的內容與義理，或探討鸞堂的組織成員及其與社會菁英的關係，累積可觀的研究成果。不過，因各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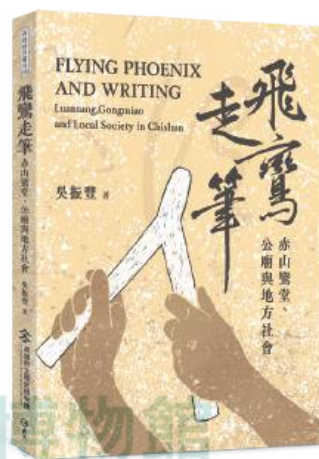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《飛鸞走筆：赤山鸞堂、公廟與地方社會》

圖片來源：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。



圖2 2016年高史博所出版的《臺灣鳳邑儒教聯堂的飛鸞勸化與其社會網絡》

圖片來源：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。

鸞堂的主事者與運作方式不同，所在的地方社會及其民間信仰情況也各有差異，故仍有許多研究的空間，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所獎勵出版的吳振豐《飛鸞走筆：赤山鸞堂、公廟與地方社會》一書，即是聚焦在赤山一地，但又能觀照整體鸞堂發展的佳作。

本書作者出身鸞堂世家，曾祖父至父親三代皆為堂生，他自小耳濡目染，因而參與誠心社明善堂的儀式與運作，並正式成為鸞生。在入堂效勞的過程中，又激發其研究的動機，而從商學院跨科報考文學院歷史學門，最終完成碩士論文並出版專書，這種將信仰與研究結合的熱情，實在令人感動。全書透過實際參與鸞堂運作的觀察，並運用內部的第一手資料，先釐清該鸞堂的創立緣由與發展歷程，再由此分析鸞堂、公廟與地方社會的互動及連結，最後提出其面臨的難題及因應對策。此一研究架構完整，整體論述亦在水準之上，值得肯定。綜觀書中較重要的論點有三：

一是將鸞堂依設立地點分為「有獨立堂址」、「無獨立堂址」兩部分。前者再依運作模式有無「公廟化」區分兩種，一為尚保持原先傳統鸞堂的祭儀、祀神、組織與運作；二為已明顯朝公廟轉型，外觀難分辨是堂或廟，並非僅祭祀堂內奉派神祇，而有增設地方信仰的神明。後者則是鸞堂與公廟在同一空間，依雙方管理組織是否相同，可再細分「寄祀」，即鸞堂長期依附在公廟內；「借祀」，即鸞堂暫時性借用公廟的場所運作；「共祀」，兩者的組織不同，但地位對等，相互協助，共同祭祀，如當前的誠心社明善堂與赤山文衡殿即是；「合祀」，指兩者管理組織已合而為一，可再細分兩種，一是鸞堂被公廟合併，有名無實，已無運作；二是廟堂合一，鸞堂雖仍保有扶鸞儀式，但已與公廟化鸞堂無差異。這個細密的分類系統，乃作者長期而深入在鳳山地區的調查而來，甚為完備且合乎實情，也可看出鸞堂與公廟間的複雜關係。

二是從「信仰」與「儀式」來討論鸞堂與公廟的依存關係。如同作者的觀察指出，對誠心社明善堂而言，堂內擁有穩定進行「儀式」的堂生，但「信仰」群眾匱乏；而赤山文衡殿則擁有穩固的「信仰」信徒，卻欠缺執行「儀式」的人員。重建後的赤山文衡殿成立管理委員會，雖與誠心社明善堂分屬不同管理組織，但廟內的祭聖仍維持先前模式，由該堂主導，並新增初一、十五的消災科儀與七月普度。這些祭儀的執行，堂生採「服務」協助性質，雙方無對價關係，鸞堂出「人」擔任經懺誦唸與聖樂演奏搭配，廟方則備妥各項供品等「物」，雙方採「互助」方式，而此一模式也延伸至赤山聚落各廟宇。書中還提到這些祭儀不僅鸞堂人員執行，廟方人員與一般信眾也會參與；而鸞堂以

「指示」、「請示」來進行濟世服務，也都滿足一般民眾的信仰需求。此一論點頗能切合誠心社明善堂與赤山文衡殿的依存關係，亦可視為鸞堂與公廟較佳的互動模式；不過，鸞堂過度為公廟提供祭典儀式服務，是否會淡化其最核心的飛鸞勸化功能，亦是值得持續觀察的。

三是從地方社會的角度，以「神」與「人」來連結鸞堂與公廟。作者指出鸞堂內部奉祀的「恩師」，是最為頻繁降鸞及與堂生淵源較深的神明，他從誠心社明善堂的首科鸞書中，發現任職的「恩師」除正副主席外，皆與地方聚落公廟主神有所連結，如大社青雲宮神農大帝、八隆宮池府千歲、鳳邑城隍、五塊厝文衡聖帝等，使雙方產生「共神」的關聯，進而拉近與居民的距離，增加其認同感，以加速鸞堂在地方社會的發展。再者，誠心堂明善社在戰後初期透過地方菁英的協助，方能進入聚落庄廟內寄祀，並持續穩定發展至今。這些地方菁英有公務型、政治型、管理型三類，有的身兼鸞生與地方民意代表，有的則參與公廟事務，並具有堂生身分，他們協調並連結鸞堂與公廟間的互動，也使具有封閉性、神秘性的鸞堂，得以順利地融入地方社會。雖然學界透過民間信仰研究地方社會的組織與運作已有不少成果，但本書以神際、人際網絡來連結鸞堂、公廟與地方社會，確實能找到三者之間的關聯性，並提供鸞堂研究的新視野與思考方向。

最後本書作者指出現今鸞堂面臨鸞生不足、老化，及一般民眾難以接觸、參與的問題，他並提出要朝「永續長存」、「向外拓展」兩方向解決，運用祭儀影像化、活動透明化、扶鸞科技化、鸞文電子化等方法，這些都可感受其保存鸞堂文化的焦慮感與使命感。不過，民間信仰與制度性宗教不同之處，在於其更具彈性與包容性，能隨著時代變遷而自我調整，這也是其能延續不輟，甚至日益興盛的原因所在。事實上，在筆者所接觸由鸞堂轉型為公廟的案例中，如左營啟明堂、東照山關帝廟，不僅都能維持鸞堂組織與扶鸞傳統，更透過多元的祭祀、慈善及文教等活動，吸引更多民眾參與，擴大社會的影響力，更能達到勸善教化的效果。因此，只要能維持飛鸞勸化的核心精神，應以更開放的態度，容許鸞堂自我調整、創新與轉型，如此才是可長可久的發展之道。